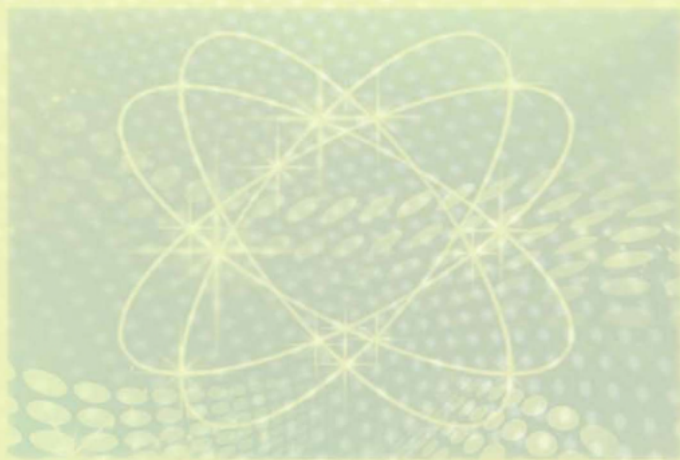


叙事学 叙事理论导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总 序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已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理论行程。尽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起有伏，然而，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便是，迄今为止，它仍在当代世界的理论潮流中独树一帜，当代叙事理论依然显示出其勃勃生机。

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涓涓细流逐渐汇为理论与实践的潮流。这一潮流发展的势头不仅迄今未减，还有延续甚至加速之势。从各种学刊上不断增加的叙事学研究的论文和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论文，从进入叙事学研究行列的年轻学人逐渐增多，从国内叙事学界与国外同行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与对话等等，或许多少可以感受到这一势头的端倪。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来从国外引进的文艺理论中，鲜少有如叙事理论这样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影响如此之广的。同时，在吸取国外理论有益营养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又努力挖掘自身丰富的理论资源，发展具有中国意义的叙事理论，以主动的面貌，回应这一理论，促使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源自于它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既能对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引作用，又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对理论本身作必要的补充、修正、革新与完善，使之能够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理论的敏锐性，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促成双方的发展。就此而言，叙事理论是成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纠正了将自身限制在文本之内的倾向，改变了纯粹形式研究的意图，延伸了此前未曾触及的领域，跨越了不同文类的鸿沟……在保持这一理论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与其他理论形成有机的融合，不断增强其分析与阐释的有效性。叙事理论这样一种研究和创新的状况，国外国内均可看到。

在中国当代叙事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中，引入国外叙事理论功不可没。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国外重要叙事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到 21 世纪

初申丹教授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这些理论译作对中国叙事理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它扩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目前，国内外的叙事学研究正处于向纵深发展之势，新的研究常跃入人们的眼帘，对原有基础理论的探讨也不断加深。为适时了解国外叙事理论的发展状况，促进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引入一批新的国外理论著作又适当其时了。有鉴于此，我们着手组织翻译出版“当代叙事理论译丛”。这套丛书入选书目均为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出版（或修订再版）的叙事理论著作，既注重在基本叙事理论阐述中具有新意的著作，也注重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分支中具有影响的著作，同时还考虑那些融入新的内容、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书，目的在于既能给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必要的参考，也能给步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子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一批挑选的著作共五种，均出自欧美当代有影响的叙事学家之手，分别为：

1. [荷]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hir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2. [德] 沃尔夫·施密德：《叙事学导论》（Wolf Schmid. *Narratology: An Introduc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10）。

3. [荷] 彼得·沃斯特拉腾：《电影叙事学》（Peter Verstraten. *Film Narrat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4. [美] 戴维·赫尔曼、詹姆斯·费伦、彼得·拉比诺维奇、布赖恩·理查森、罗宾·沃霍尔：《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David Herman, James Phelan, Peter Rabinowitz, Brian Richardson, Robyn Warhol. *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美] 布赖恩·理查森：《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丛书的前两种均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巴尔的这部著作自 1985 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已成为国际性的叙事理论经典的导论，是一部普遍采用的教材。

它的目的在于提供在文学与其他叙事文本研究中运用的系统的理论描述，阐述叙事的基本要素，叙事技巧、方法，它们之间的转换、接受，使我们得以既理解文学作品，也可以理解非文学作品。该书的前两版均有中译本，但早已绝版，列入丛书的是 2009 年出版的作者作了较大修正与补充的第三版。

施密德的《叙事学导论》是德国著名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 (De Gruyter Textbook)，为当代叙事理论的典范著作。它不仅着眼于叙事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为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整套可资借鉴的学术体系和理论框架。它概述了叙事理论，分析了虚构与模仿、作者、读者、叙述者等基本概念，较为详尽地解释了诸如叙事作品的实体存在、叙述性等一系列叙事学核心概念，讨论了叙述交流框架、视点、叙述者文本与人物文本之间的关系和事件的叙述变形等热点问题。

后三种为在叙事理论各个研究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沃斯特拉腾的书提供了电影叙事学分析的一个基本指南。它在进行叙事理论与电影分析的跨学科研究中，结合叙事理论，联系从好莱坞到先锋电影的诸多电影文本，对电影叙事进行了精当的分析与阐释。

《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是一部十分独特的书，它出自五位当今美国叙事学研究各个方向的领军人物之手。该书从叙事理论的最新发展中选取一些核心概念，即作者、叙述者与叙述，时间、情节与进程，空间、背景与视角，人物，接受与读者，以及叙事价值、审美价值等进行探讨，分别从修辞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叙事与思维关联研究、反模仿研究等四个不同的理论视野依次探讨这些核心概念。与此同时，在各自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批评性辨析，相互作出回应，充分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理论交流，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出发，加深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理解，对叙事理论诸多方向的发展产生清晰的认识。

《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是非自然叙事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认为，存在着三类基本上不同的叙事：非虚构叙事，模仿虚构叙事，违反模仿实践与目的的非自然虚构叙事。在过去的 75 年中，每一类叙事学都忽视、摒除非自然叙事，试图构建起一种加以整合的普适的叙事学，而这些叙事学几乎只包括非虚构叙事与模仿叙事。模仿理论原则上无法公正合理地处理反模仿的实践，它只能讲述故事的一半，而叙事学需要将两

者包含在内。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恰恰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获益：在理论层面上，它有益于一个真正全面的叙事学，而非仅仅适用于部分的叙事学的形成；在分析的层面上，它可以使人们关注与大量模仿文本相对的非自然叙事文本。该书联系作品，集中对非自然叙事在理论上进行阐释，并关注其历史的发展与实践的阐述，是这一领域中一部最新的著作。

在选择与确定翻译作品等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不少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巴尔教授、施密德教授和理查森教授帮助我们选择书目，联系版权事宜。其中关于非自然叙事研究的书，我们早先确定的是理查森教授一部获“国际叙事研究学会”年度著作奖项“伯基斯奖”的书，但在与他联系时，他主动告知我们他定于2015年5月出版的书更为合适，并在书未出之时便为我们联系版权，这样，才可能有他这部最新著作的译本。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马佩林先生。在获知我们的设想后，马佩林先生十分支持，讨论计划，安排联系版权，并在丛书最后确定之后，特意从北京来到昆明，参加丛书的出版签约仪式并代表出版社在合同上签字。

该丛书由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负责翻译出版，这是中心一项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将在第一套五种的基础上，根据需求和可能，继续选择后续的重要著作进行翻译，以进一步为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努力。今年11月，第五届国际叙事学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将在昆明召开，由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承办。届时，本译丛著作的一些作者，如詹姆斯·费伦教授、沃尔夫·施密德教授都将应邀与会，这是日益密切的国内外叙事学界交流的又一个明证。我们希望这样的交流不断进行下去。

译事艰难，理论著作的迻译尤非易事。尽管从一开始我们便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但限于能力和水平，不当之处必定难免。学界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是对我们最好的关心与帮助，我们当诚以待之。

谭君强

2015年夏于云南大学

第一版译者前言

叙述学（narratology）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法国兴起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它早已越出了法国的国界，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兴趣。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华莱士·马丁在其 1986 年出版的《当代叙事理论》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过去 15 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今天，当欧美某些曾经流行一时的新理论已成明日黄花之时，叙述学仍然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我国，对于叙述学理论的研究，以及运用叙事理论对于文本进行分析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叙述学，简单说来，就是关于叙事文本的理论。就理论渊源而言，它上承 2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雅各布逊所提出的“文学性”，即文学作品能够成其为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的理论，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上述批评的核心，均着眼于文本批评，正是它形成了当代批评一个经久不衰的潮流。叙述学可以说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是它的直接成果，然而它又发展并超越了结构主义文论，形成具有自身特征和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学说。因而，当结构主义已经失去当年雄踞批评论坛的地位之时，叙述学依然能够独领风骚，并仍在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我们知道，“叙事”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离不开交流，一个对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着某些东西，都是广义的叙事。在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叙事作品，一如巴特所言：“对世界的叙述，无计其数”，他并且得出了不同媒介的叙事文本都基于一个共同的模式，一个导致叙述被承认是叙述的模式这样一个假定。而对这一一般模式的探寻，在早期的叙述学研究中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这样一种宽泛而抽象的研究，毕竟难于取得长足的进展，因而人们逐渐更多地将研究范围

集中在以书面语言媒介作为载体的叙事文本中。在对这样的叙事文本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中，也由对叙事较为单纯的神话、民间故事等的研究发展到对小说的研究，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当代叙述学理论的重要基石，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一书，正是基于对普鲁斯特卷帙浩繁的划时代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所作分析研究的结果。

叙述学作为对叙事作品进行微观研究的理论，体现了文本批评着重研究作品的形而下层面的原则。杨周翰先生曾将中西流行的两种差异极大的批评方式或倾向用“镜子”和“七巧板”加以标志。中国批评家所专注的是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而西方批评家则观照作品本身，犹如一位手拿手术刀的外科医师，时刻准备切开作品的各个部分，也可以说如同一个面对着七巧板的整套部件苦思苦想的人。^①叙述学正可以说体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这一明显倾向。它是文本批评的集大成者，它明言将读者所面对的叙事文本区分为几个层次，而撇开其事实上的不可分性，并且将这种基于推理过程的理论假定作为叙事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它可以自由研究与分析在文本的各个层次中的不同建构，从而总结出一整套分析叙事作品的理论模式。应该说，叙述学所概括出来的这一套理论模式，具有可操作性的特征。这一模式仿佛给人们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标尺，为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1987年，笔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曾拜访过西欧的汉学重镇——莱顿大学汉学院。当时，该院教师艾丽·哈格纳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与她的交谈中，笔者对她所说的一句话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可以用叙述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决不雷同的结论。”她的论文就是以叙述学理论，尤其是叙事话语理论中的自由间接话语来探讨中国当代作家王蒙、张洁、张抗抗的作品。不久以前，笔者收到了哈格纳博士寄来的她已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意识流与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自由间接话语》，翻阅之余，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与传统的文本批评理论一样，叙述学完全割裂了叙事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创作主体等的关联，而将叙事作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体

^① 参见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系。这自然为这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带来了某些弊端。实际上，文本批评的这种片面性已越来越为欧美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所诟病，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对于同样属于文本批评之列的分解主义（Deconstruction，又译解构主义）发出了这样尖锐的批评：

分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文本组成的，因而他们沉溺于文字游戏的象牙塔里。他们知不知道，这世界除了文本之外，还有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受苦挨饿！他们却抛弃了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主张！^①

十分有趣的是，目前在欧美所流行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新历史主义，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层次上使文学批评向社会历史层面作某种回归，这或许正是一种批评的循环。指出叙述学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决不是要否定这种理论独特的价值，也不是要抹煞它与其他批评理论的区别——一种新的理论的建构，有时往往要将其某些特征推向极端，以使其在理论批评的潮流中独树一帜——而是要指出，我们大可不必在运用叙事理论分析叙事作品时陷于孤立化、绝对化。叙述学理论毕竟只是理论潮流中的一种，尽管是十分有价值的一种。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完全可以将它与其他批评理论，包括与社会、历史的批评结合起来，这样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而又能避免某些片面性。近年来，国内一些运用叙述学理论的研究者的一些成功研究，所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的作者米克·巴尔教授（Prof. Mieke Bal），1946年生于荷兰，现任教于阿姆斯特丹大学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为国际文艺理论界知名学者。巴尔教授1969年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1977年获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任文艺理论助理教授，副教授。1987年8月至1991年6月任该校教授，同时兼任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教授。1991年7月起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文艺理论教授。她曾撰写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发表了一百余篇论文，并应

^① 王宁：《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诸问题——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见王宁：《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185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邀在美、英、法、意、加拿大、瑞士、以色列等世界各地的数十所大学作学术讲座。作为一位有着广泛兴趣的学者，巴尔教授在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以及艺术史方面产生过相当影响。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期间，她还创立了跨学科研究项目“比较艺术”，这是比较文学、电影研究和艺术史的结合，在她关于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研究的著作中就反映了这一研究的跨学科性。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阐述了系统的叙述学以及相应的概念。作者在本书中所阐述的叙事理论，主要是基于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叙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在任何研究中，准确地界定和理解一系列概念十分重要。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对有关概念、尤其是一些核心概念的明确界定。按作者的界说，文本（text）指的是语言符号的一个有限的、被组合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narrative text）是叙述人在其中进行叙述的文本；故事（story）是以一定方式对于素材的描述；素材（fabula）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这里需要对素材（fabula）加以说明。俄国形式主义者将叙事作品区分为“法布拉”（фабула，英译为fabula，中译通常为“故事”）与“休热特”（сюжет，英译为syuzhet，中译通常为“情节”），什克洛夫斯基实际上所指的是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故事”必须经过“陌生化”的变形才能成为艺术作品，成为小说的“情节”。因而这里的“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加以创造性的变形。英国作家兼理论家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也将故事（story）与情节（plot）加以区别，实际上指的仍是按实际顺序发生的事件在小说中构成为艺术情节；法国叙述学家托多罗夫则采用“故事”（histoire）与“话语”（discours）这两个概念来区分作品的素材与经加工之后的表达形式。在本书中，所使用的“fabula”（译为“素材”），实际上与通常所译的“故事”相对应，而本书中所使用的“story”（译为“故事”），按作者的界定指“以一定的方式对素材的组合”，实际上近似于“情节”（syuzhet）。

对于叙事作品，作者将它分别置于三个层次——素材、故事、文本。这一区分贯穿着一个假设，即分别分析这三个层次是可能的，尽管它并不意味着这些层次相互独立存在。事实上，只有体现在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文

本层次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在“素材”这一层次，作者分别探讨了事件、行为者、时间、场所等基本要素，所有这些都是与作为按实际顺序发生的事件所必不可少的；“故事”层次中，则探讨了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变形的问题，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节奏、频率与聚焦等；“文本”层次，也就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则从叙事文本分析中最中心的概念“叙述者”入手，分别探讨了非叙述的评论、描写以及叙述层次等问题。

本书的目的在于对叙述学作一系统阐述，因而并未展开在叙事理论这一领域中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作者本人对于国际叙述学界的知名代表热奈特的不少观点持批评态度，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于1972年发表之后，作者1977年发表了《叙述学：关于四部现代小说的叙述意义》一书，通过对四部小说的分析，对“热奈特系统”进行了分析批判。热奈特1983年发表的《新叙事话语》，主要就是对米克·巴尔看法的针锋相对的回答）。自然，在作者的阐述中，既融汇了叙述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包含着作者许多不无独到之处的看法。比如，作者接受了热奈特关于省略、概略、场景、停顿这四大基本的叙述运动形式的划分，但增加了第五种叙述运动：减缓。在对叙事理论进行描述中，本书还结合来自各方面的具体的作品文本进行分析，这样，既提供了运用这一理论的某些范例，也为一部较为抽象的理论著作增强了可读性。

本书原文为荷兰文，出版之后，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1985年分别出版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译本。本译本据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译本译出。本书的荷兰文本已重版五次，售出一万五千册之多，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在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售出这样一个数目，应该说是令人瞩目的。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米克·巴尔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

谭君强
1993年8月

第二版译者前言

叙述学 (narratology)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法国兴起以来, 发展十分迅速, 并且很快越出了法国的国界, 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今天, 它仍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中心之一。在我国,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对于叙事理论以及运用叙事理论进行叙事文本分析的兴趣持续不断。

现代叙事理论的形成可以说是 20 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它的发展几乎是与结构主义、尤其是与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同步的。叙事理论早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同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如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它是结构主义文论自然而然的延伸, 并在特定研究领域中对它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由此, 叙述学自身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并沿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不断延续与拓展。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 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 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 而这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社会现象是由体现在现象中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要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就只有掌握这些现象的内在结构。而所谓结构, 就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组合, 其中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 是以它们对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在皮亚杰看来, “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 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①。整体性指的是结构内部的相互沟通性; 转换性指“结构”成为一个具有若干转换的体系, 而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 自身调整性则指结构可作自身调整, 它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这就决定了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所具有的特征, 这些理论特征与方法在叙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就叙述学研究本身而言, 它主要集中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是叙事结构的层面, 它研究叙述 (不论是以何种表现媒介出现的) 的性质、形式、

^① [瑞士] 皮亚杰: 《结构主义》, 倪连生、王琳译, 2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功能，并试图归纳出叙述的能力。它在故事、叙述以及二者关系的层次上考察所有的、并仅仅只是叙事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探讨使它们得以相互区分开来的因素。另一个则是叙述话语的层面，它研究叙事文中话语表现模式中的时序状况与事件，集中于故事与叙事文本、叙述过程与叙事文本，以及故事与叙述过程之间可能的关系，而不关注故事层次本身，也不试图去建构诸如故事或情节语法。具体说来，它考察时态、语式、语态这样一些问题。^①

在叙述学研究中对于叙述建构的关注，是与结构主义关系更为密切的层面，用普林斯的话来说，它是由结构主义所激发（*structuralist-inspired*）^②的研究层面。这一研究无疑受到了由普罗普所开启的对于俄罗斯童话故事所做的结构研究的影响。它所关注的是被叙述的故事的逻辑、句法、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叙述语法问题。它试图要在不论以何种媒介所构成、任何具有所谓叙述性的叙事作品中，去探寻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叙述结构。它在早期所进行的这种努力，一如巴特在他的《S/Z》一书开头所说的：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③

巴特在这里不指名地提到了诸如普罗普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所做研究的某些意图，它显然是沿袭结构主义研究方向的结果。这种研究状况多少反映出人们对曾经主导文学研究中那些无视对文学作品内部研究的关

① See 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 65.

② 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 65.

③ [法]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注所作出的反应，一如热奈特所说：“人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文学视为一个没有代码的信息，因此现在有必要暂时将它看成一个没有信息的代码。”^① 这些研究是以较为简单的叙事作品作为对象的，它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他们所做的研究相符的。叙述语法的探寻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叙事作品的构架与叙述逻辑自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叙事作品在结构意义上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也打开了一条进入叙事作品内部研究的途径。

然而，当一定的叙述构架已经被揭示出来，一定的模式已经被建构起来之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对这些叙述语法的一般了解，而将其研究深入到叙事文本中，探讨叙事文本中的话语表现模式以及故事与叙事话语之间的关系等。热奈特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叙事话语》的发表，不仅是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也为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它日益形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主流，并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为人们现在称之为“经典”叙述学的阶段。除热奈特之外，里蒙—凯南、查特曼、普林斯与斯坦泽尔等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属于这一范围。这些研究继承了早期叙述学研究中已有的成果，但又与早期的研究明显不同。他们不再试图去探讨无边无际的具有所谓叙述性的一切叙事作品，包括用各种媒介表现出来的叙事作品的基本叙述语法，而主要基于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叙事文本为其研究对象，而且更多的是以大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在这样一些叙事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叙述性以及叙事话语中的种种形态。由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叙事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其所取得的成绩和具有的影响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基于对这样一些叙事作品所做的叙述学研究无疑为叙事理论的实践与运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而理论研究本身也一直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之中。

与叙述语法的研究一样，基于叙事话语的叙述学研究仍然将其研究的

^① [法] 热奈特：《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载《辞格一》，巴黎瑟伊出版社，1996，150 页；转引自张寅德：《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嬗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41 页。

范围限定于叙事文本之内，专注于一种按照二元对立原则所界定的形式概念或范畴的研究，而并不考察它与超越叙事文本这一范围的外在关系。然而，在叙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早期叙述学研究中的一些偏激的、绝对化的理论倾向受到了或多或少的质疑。对于那种将文本孤立于产生文本的外在因素而进行研究的意图与方法，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明确指出“文学必须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文学再也不是一个隐蔽的、‘自律的’领地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仅局限于文学文本。”^①

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趋向下，文学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变，从强调对作品内在的文本研究转变为不仅仅关注对文本内在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对文学与其外在关联的研究。反映在叙事理论的研究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述学研究，即所谓后经典叙述学研究（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中，这种理论转变产生了明显的反应。叙述学跳出了长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事文本内在的封闭式研究的窠臼，在保持其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特有的理论模式的同时，它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其他的研究方法，诸如女性主义、巴赫金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精神）语言等相沟通，从而形成叙事理论研究融会贯通、向纵深发展的局面，由此相应出现了叙述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1999年主编出版了《叙述学：叙事分析的新视野》（*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书名中的“叙述学”一词使用了复数就是对这种局面的最好反映。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论所经历的不是它的终结而是持续的、有时令人吃惊的变形，这种变形自里蒙-凯南出版她的著作以来就开始了。“在互相渗透的年代里，单一的叙述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分支为多种叙述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关于故事的理论

^① 王宁：《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诸问题——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见王宁：《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185、186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